

圣经基督教教会及其在滇黔川的活动

□ 东人达

(重庆三峡学院民族学系,重庆 万州 404000)

摘 要: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是位于英格兰西南山区的一个小规模地方教会,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和我国西南各民族群众身受剥削压迫的背景下。该教会在滇黔川一带,突破传统的布道战略,再加上某些劳动阶级的传教士和少数民族族群出身背景所产生的天然作用,使得该传教团由早期在华 20 年的困境迅速扩展为 6 万人之众。

关键词: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滇黔川

中图分类号:B9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96(2005)01-0015-05

The Bible Christian Church and Its Activities in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DONG Ren - da

(Ethnology Department, the Three Gorges College of Chongqing, Wanzhou, Chongqing 404000 China)

Abstract: The British Bible Christian Church is a small - scale church located at the southwest mountain area of England. In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Provinces, this church has broken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preaching strategy, by the natural affect of some working class missionaries and the family background of some nationality group, it has been enlarged into a preaching group of more than sixty thousand people from the early predicament of 1920s.

Key words: Britain; the Bible Christian Church; Yunnan, Guizhou and Sichuan

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属于基督教新教的卫斯理宗即循道宗,于 1815 年创建,1907 年并入英国循道公会联合会,是英格兰西南山区的一个小规模地方性教会。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往我国云南派驻传教士。由于以城镇汉人为传教重点,传教团曾陷入长达 20 年的困境;后来柏格理等人突破传统的布道战略,突入滇黔川边少数民族地区,取得了震惊海内外的业绩,方才引起世人的注意。

由于国内资料的缺乏,圣经基督教教会的历史背景及其传教士在西南的早期活动情况,已经鲜为人知;其在华活动的后期情况,也有多处模糊不清。笔者根据新搜集的大量历史文献,尤其是从英国本土发掘的相关资料,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复原及分析。

主要内容有:英国劳动阶层的宗教组织圣经基督教教会的创建;最初来华的人员、路线及传教

点的设立;传统传教模式导致传教团的早期困境;柏格理等人突入滇黔川边农村后发展成 6 万之众的教会;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英国劳动阶层与少数民族族群出身与由这种出身产生的自发作用。

一、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

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属于基督教新教的卫斯理宗即循道公会。卫斯理宗是应对产业工人阶级诞生后英国社会出现的信仰危机现象,由约翰·卫斯理(1703-1791)、查理·卫斯理(1707-1788)兄弟创建的。

卫斯理宗的信徒来自社会下层的劳动群众。其总体特征为:强调凭信仰得救与普遍之爱;注重个人修养与服务社会;重视简单而庄重的圣洗和圣餐;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原则。由于它的产生适应了新的时代需要,因此迅速发展成世界基督教新教的六大宗派之一。

圣经基督教教会,也被称为圣经基督教公会

或圣经基督徒会,是位于英国西南康沃尔、德文一带的卫斯理宗的地方小规模教会。循道公会最早派到中国云南的传教士万斯通、索恩、柏格理、邵慕廉、张道惠、王树德等,就属于这个小教会。

据笔者考证,圣经基督教教会于1815年创建于英国康沃尔郡。甘铎理的《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中,在介绍最早到云南昭通传教的托马斯·索恩时,注明:“圣经基督教教会的首次活动于1815年在他曾祖父约翰·索恩的农场厨房里举行。”^{[1]472}

而在《柏格理日记·前言》中,甘铎理这样介绍:“我喜欢思索这个历史性的开端,它并不是指这些年轻传教士东渡中国之时,而是追溯到人们回忆看见约翰·卫斯理乘马穿过康沃尔的渔村和矿区工棚的日子。老柏格理于18世纪末期就生活在康沃尔北岸的帕兹托。他的坟墓仍旧在那里,墓碑上写着,‘塞缪尔·柏格理死于1832年’。”^{[2]605}由此可以断定,圣经基督教教会是在约翰·卫斯理的直接影响下创立,那是柏格理爷爷的时代。

英国林肯大学的艾莉森·刘易丝教授给笔者的信中谈到:“约翰·卫斯理曾经前往康沃尔和德文巡行,在旷野里布道,住进农舍里,会见矿工、农夫与渔民。这是一场由巡回传教士发起的运动,他们生活简朴,宣讲和布道十分简要却感人而实在。”

圣经基督教教会的基本成员,为英国下层社会的劳动阶层,虽然自身处于相当贫困的状态,还是热情支持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从帕兹托和梅瓦吉西的渔民、科尼什的农业工人、德拉博尔的石匠到南安普敦的学徒,都自愿献出了自己微薄的收入,基督徒的信念推动了世界性的变革。”^{[2]605}

19世纪中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扩张浪潮,这个规模不大的地方性教会也开始向国外派遣传教士。“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的确,规模不大和地方性的圣经基督教教会仅在英格兰西部与南部有教堂分布,却认为自己有责任充分关心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其他人群,乐意以其非常有限的资源来支持一名在中国的传教士。尽管无论从数字还是从实际看,它的成员绝大多数来自劳动阶层,却仍对传教事业显示出一种浓厚的兴趣。他们已经负担着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传教工作。往中国传播福音则是一次新的探险,这个充满活力的年轻教会毅然担当起该项职责,是表明他们对传教事业高度热情的一个意义深远的征兆。”^{[1]458}

由于圣经基督教教会的成员源自社会下层,财力、人力有限,派出传教士的薪水待遇与其他基督教宗派相比是最低的,海外传教活动也难以长期维持,只是1907年卫斯理宗各派别的联合,才为其在中国的传教团的活动增加了物质支持。

二、圣经基督教教会传教士来华

圣经基督教教会与由英国传教士戴德生所创建的基督教组织中华内地会关系密切。在内地会

的倡导下,也决定参与中国西南的传教活动。“圣经基督教教会是应赫德森·泰勒的热情呼吁而承担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多年来它的工作与中国内地会传教团保持着密切的交往。”^{[1]460-451}

于是,内地会与意图一试身手的圣经基督教教会,就成为率先进入中国云南的2个基督教新教传教团。“其时,云南是基督教在华传播的空白区,被教会称为‘中国最黑暗的省份’。因此,他们积极探索入滇拓荒的路径,1877年,内地会牧师麦嘉底从上海出发,横穿中国腹地,经滇西步行至八莫。成为第一个在云南民族地区留下足迹的基督教传教士。虽然麦嘉底的旅行是非传教性的,但却为基督教进入云南,提供了可能的途径。1881年,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夫妇从上海绕道缅甸,进入滇西大理,开办了基督教在云南的第一个教会。两年后,英国传教士索里仁等人由川入滇,在滇东北昭通、东川开办教会,1887年,循道公会牧师柏格理和邵慕廉也由川入滇,在昭通开办教会。至此,由东西两方面入滇传教的道路基本打通,基督教在云南开始传播。”^[3]

以往,由于国内资料所限,对于圣经基督教教会到云南活动的初期情况不甚明了。现在,根据笔者近年搜集的国外史料,可以对19世纪末该教会在西南的活动作出一个大致的描述。

1883年,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的2名年轻传教士万斯通(T. G. Vansstone)和索恩(Samuel T. Thorne),启程前来中国。到中国后,他们溯长江而上到四川宜宾,再由陆路抵达滇东北的昭通,建立传教点。而后南下昆明,在那里开辟了另一个布道所。索恩应是上面提到的索里仁。

圣经基督教教会的第2批来华传教士是塞缪尔·柏格理(Samuel Pollard)、邵慕廉(Francis J. Dymond),于1887年1月离开英国,27日从荷兰南部城市提尔堡,搭乘舟山号轮船启程,又改乘白夏瓦号轮船,3月14日抵达上海吴淞。他们先到内地会设在安庆的传教士汉语学校学习。

1887年11月12日,柏格理、邵慕廉与在上海刚举行完婚礼的万斯通夫妇,乘轮船前往武汉。在汉口改乘帆船,逆长江而上,在三峡的倾天滩遇险船毁,死里逃生。1888年1月7日到达重庆。在重庆稍事休整后,柏格理与邵慕廉取道四川泸州去云南昭通,万斯通夫妇则径直前去昆明。

传教士由英国到上海,溯长江而上,再改陆路前往云南的线路,还有一种走法,即在重庆换成小木船,沿江而上,到达木船向上游航行的极限云南省水富县城,再由水富改陆路南行,沿秦汉“五尺道”、“南夷道”线路,过盐津豆沙关,最终到达昭通。

这条早期传教士入滇最常走的“大路”,要安全与快捷一些。所谓安全,只是与其他途径相对而言,其中还是充满艰辛与危险。柏格理就曾谈起经过长江三峡时的风险:

“中国西部的传教士就曾经历过多次船只失事。在1887年,T. G. 牧师、万期通夫人、弗兰克J. 邵慕廉牧师以及作者本人,好不容易才从波涛

中逃生,当时他们的船全部被毁,几乎损失了所有的行李。其后,刘易斯·萨温医生的船沉入江底,他的医疗设备损失严重。第三例是两位女士,她们在自己的船严重撞碎的瞬间及时跳到了另一条船上。以及后来 C. E. 牧师和希克斯夫人、A. 埃文斯牧师和莉莲·格兰丁医生都遇到过可怕的险情。我们已经向无法满足的扬子江付出了足够的通行费。”^[4]

另一条“大路”,即内地会传教士克拉克绕道缅甸,在进入滇西的线路,比走长江要危险一些。

后来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又出现了2条从欧洲来华的更为安全、快当的线路。一条是从我国东北哈尔滨、满洲里,乘火车经贯通西伯利亚的铁路抵达欧洲;另一条是乘船从英国到上海,再到香港、法属殖民地越南,乘坐越南东京至昆明的火车。

三、城镇汉人战略导致的20年困境

圣经基督教教会最早来华的传教士万斯通、索恩、柏格理、邵慕廉,都是出身英国社会下层的富有宗教献身精神的年轻人。他们身着汉族装束,戴假辫子,日复一日,起早贪黑,或大街小巷、或走村串寨,前往城市及郊区,用汉语宣传、布道。

但是汉族居民的冷淡反应,却出乎于他们的意料。他们经常招致孩童“洋鬼子”的嘲笑声与掷来的石子、瓦块。这种反应让年轻的英国传教士感到刻骨铭心。

给柏格理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汉族群众对于他们兜售或赠送的基督教宣传品的怀疑与抵制情绪。“他们的怀疑通过购买传教士的印刷品时的一个非常令人恼火的举止显示出来。他们可以付少许几文钱买一本印有经文的小册子,然后拿在手中,于打开之前上下左右闻上一遍。因为有一种谣传说,外国人所卖的小册子中含有能够伤害人的毒药,买书者就试图通过嗅觉来发现任何毒物的蛛丝马迹。这件事从另一个角度描绘出了汉人礼节的负面表现。出于礼貌的原由,你必须双手递出或接过书本,但是却无法防止买书人当着他的面嗅书,因为他担心可能会被你毒害。于某日走访过几个村寨后,晚上柏格理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今天有更多的人闻到了《圣经》。’”^{[1]484}

在进入中国之初,圣经基督教教会及其派出的传教士,对于中国的国情,尤其是西南多民族分布的情况,基本上是不了解的。由于该团体与内地会的友好关系,就很自然地采取了戴德生所提倡的“迅速扩张战略”,沿着主要的交通线,以省会及府、县城市为据点,再向周边传播。他们抵达云南后,就按照这个城镇加汉族的思路,在古老的西南丝绸之路的干线上,设立了昭通、昆明、会泽3个布道点。

“柏格理与早期传教士们抵达中国时,他们所接受的是首次实施传教工作的普遍指导原则。他的想法与其他人一样,将目光盯在汉族上,汉人生活在城墙环绕的昆明、街道狭窄的昭通城中,以及那些产稻谷的坝子上无数个星罗棋布的用泥土筑成的村庄里。首先开展工作的三个地方都很自然

地选择了这条主要商路上的三座城市,就像水一样,基督教是沿着已经冲刷出来的沟渠在流动。”^{[1]508}

当时,他们没有察觉到大量少数民族群众的存在,也根本没有在他们之中发展教会组织的意识。“关于柏格理和他在西南的工作,有一个有趣的事实即云南的教会,他身为一名牧师,教会全然没有在少数民族中开展工作的意图,而于开始时柏格理本人也并没有察觉到他们的存在。教会给他的全部计划,就是应该在云南的汉族人中进行工作,并没有把布道延伸到中国西南各省毗邻区域的非汉人各民族中的建议。”^{[1]474}

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圣经基督教教会传教士遭遇到的,是既成社会结构稳定与传统文化沉积厚重的城镇及郊区的汉族居民。加上生存环境恶劣,导致这些年轻的英国人非病即死、即残,整个传教团的活动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之中。

1885年,万斯通、索恩抵达云南,先后在昭通、昆明开设了布道点,但没有人皈依。

1887年,柏格理、邵慕廉到中国,次年年初抵昭通。不久索恩前往驻有英国领事的重庆完婚。柏格理、邵慕廉留在昭通,立即投入紧张的布道之中。但邵慕廉很快就染上天花,在柏格理的悉心护理下终于痊愈。由于索恩结婚后住房紧张,柏格理就前往昆明,加入万斯通夫妇的布道点。期间,开辟了会泽传教点。

1889年,万斯通患疟疾卧床不起,万斯通夫妇的小女儿夭折,柏格理亲手将她埋葬。为了能够修养恢复,万斯通移居比较僻静的会泽传教点,但不见效果。后来,被迫拖着病体启程回英国。

同时,在昭通的索恩夫人患重病。圣经基督教教会的传教士难以应对,只好请了内地会昆明传教团的2位女教士前往帮助护理。柏格理也染上反复发作的疟疾。1891年10月,索恩在昭通病逝,索恩夫人立即回国。而圣经基督教教会新派往中国的2位传教士,刚到上海就有1个患热病去世,另1位雷姆伯斯终于抵达昭通。

在巨大的挫折面前,就连柏格理的挚友与同事邵慕廉也一度丧失了信心,向国内的差会寄出辞呈。后来在柏格理的激励下,又收回了辞职书。

劳而无功的结果与惨重的代价,是英国国内圣经基督教教会所始料不及的,加上柏格理“所属的小教会正在把注意力由传教事业向为国内小土地所有者服务转移”,就发出了放弃在云南传教活动的建议。^{[1]482}只是由于柏格理的执著坚持,圣经基督教教会在华的传教活动才没有中断。

但由于人手少,财政困难,就暂时放弃了在昆明的传教所。关于昆明的传教业务,柏格理1895年第1次回国休假后,又带来1名医生、男女各2名传教士后,力量有所增强,于1896年10月的另一次会泽会议上决定,“将重新开展在昆明的工作。”^{[2]654}

在此期间,这些传教士倒是非常努力,不辞辛劳地布道、宣讲。还开展了医疗、教育、科普、赈灾等多项活动。在当地初步改变了居民对他们的态

度,树立了比较好的个人形象,但是愿意加入教会的人却寥寥无几。

1897年,他们在昭通创办了新式教育的学校,开始招收男、女学生,当地居民反应强烈,纷纷送子女入学。“2月14日。这里的两所学校开学了,一所收男孩子,另一所收女孩子;有九个男孩和一二个姑娘。”“两所学校业已满额,现在人数超过了一百名。”^{[2]655-656}

但是,与教会学校入学学生人数形成强烈反差,入教者却少得可怜。1893年,即传教士来到昭通整10年以后,“于9月3日、礼拜日,他们在外面露天旷野中,为首批的两个人进行了洗礼。”^{[2]649}而最早发展的教徒,都不是当地社会的中坚力量,没有什么影响力。“昭通第一个信仰基督教受洗礼的是姓马的一位老太婆,相继参加信教的还是一些老太婆、老妈妈。后来有张华堂、鄢雨沛(汉族)二人协助教会工作后,才逐渐有人信教。”^[5]

1900年义和团运动之后,因为柏格理等传教士于多年的时间里,在当地树立了比较好的形象,又加上清政府各级官员对洋人、洋教的谄媚态度,才使教会有了初步的发展。但是,由于城镇汉族士、农、工、商各阶层传统的社会与文化惯性,如果传教士不改变原来的思路,终究不会有大的突破与发展。

四、突入少数民族乡村后的巨大成就

在圣经基督教传教团处于早期的困境时,是柏格理首先改变思路,把目光投向少数民族地区。来到云南后不久,他就感知到了乡村少数民族的存在,对他们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并由感兴趣到不断主动了解,前往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在1902年10-12月的巡行布道中,他曾率领一些信徒横渡金沙江,到四川凉山的会理布道;1903年11月24日至12月初,柏格理在昭通彝族龙勇泉、龙绍舟等人的陪同下,从昭通西部炎山的新产沟(新厂沟)渡过金沙江,对凉山彝族地区进行了较详尽的考察。这次考察,不同于一般的探险,目的已经相当明确,就是将传教目标向少数民族转移。

从凉山访问回来以后,柏格理就着手进行进入凉山的各项准备。不断接待来昭通找他办事情的凉山彝族人,改善与对他有敌意的彝族家支的关系,并对清政府云南驻军与披沙(即今凉山宁南彝族)的武装冲突进行调解等等。但是,不意1904年7月,经贵州安顺内地会英国传教士党居仁的介绍,贵州威宁州的苗族求道者突然来昭通访问,就使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苗族。

1896年,32岁的柏格理被他所属的教会任命负责云南的工作,此时圣经基督教教会传教团约有10个人,昭通、会泽的教会开始发展,昆明的传教也重新启动。1900年以后,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与好势头。这个时候把发展重点转向生活条件更差的少数民族地区,是柏格理的绝大多数同事所不能接受的。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柏格理成为少数派,多数人仍旧留在城市,柏格理夫

妇,以及后来来华的张道惠夫妇则上山下乡。

1904年找到了循道公会传教士的事件,被苗族群众称之为“龙年得道”。关于这段史事,在苗文、汉文、英文文献中都有记载。1916年的石门坎苗文《溯源碑》(《石门坎苗族信教史碑》)是记载这个过程的最早老苗文文献。

碑文中记述:“到了一九零三年,听说安顺有传教士在那里传教,有些苗族就跑到那里去。传教士说:你们来这里很远,到昭通去找柏格理。这些人回来了。不久有两个苗族到了昭通,找到了柏格理。柏格理非常高兴。他说:你们两个回去,传信到苗族村寨。苗族各村寨听到信息之后,互相邀约成帮到了昭通。人多礼拜堂容不下,柏格理带了汉族老师李斯提反、苗族老人王道元、杨雅各来到苗族地方,寻找修礼拜堂的地点。最后找到了石门坎。修了教堂,办了学校,从此,我们苗族开始读书。”

柏格理、张道惠等传教士开始着手创建位于贵州威宁石门坎的教堂与学校,并以此为基地,向滇黔川边及毗邻区域扩展。

首先,是在今滇东北的昭通、彝良、大关、盐津、永善、会泽、东川、寻甸、宣威等县,黔西北的威宁、赫章、纳雍等县,奠定基础;

其次,向云南北部的昆明、禄劝、武定、嵩明、富民、禄丰发展,创建了洒普山教会中心;最后,由滇东北的镇雄、威信往四川宜宾、泸州南部的筠连、珙县、高县、古蔺、叙永、古宋等县发展。

由此形成了具有国内外影响的基督教新教的传教区域。1919年中国循道公会8个教区教徒总数7.4万人,而由并入循道公会的圣经基督教教会传教士开辟的西南教区,最盛时信徒就达6万之众。

当时,圣经基督教教会在滇黔川边的宗教、教育中心石门坎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海外天国”。外国学者至今仍对其在教育方面的作为高度评价:“通过这种方式,在两代人的时间里,苗族几乎成为贵州文化的支撑者。”^[6]

圣经基督教教会的传教士柏格理也被称为循道公会的五大使徒之一:“历来的说法乃卫理公会有五名使徒,他们是约翰·卫斯理、弗郎西斯·阿斯伯里、托马斯·科克、戴维·希尔、塞缪尔·柏格理。这是一组大家最感兴趣的伟人姓名精选。”^{[1]445}

五、传教士劳动阶级与少数民族群的出身

敢于背离传统的传教模式,到滇黔川边多民族杂居的农村传播基督教、办教育事业的圣经基督教教会的传教士,大多出身于19世纪英国的工人、农民家庭,并属于少数民族族群。他们的身后是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殖民侵略的大背景;但是,由于自发的阶级与民族属性的作用,使他们自愿到异常艰苦的少数民族居住的高寒山区布道,并取得了令世界基督教界瞩目的业绩。

柏格理本人出生于工人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帕兹托人,生于1826年3月1日。他属于工人阶级,曾作为一名机修工在查塔

姆的船舶修造厂工作过若干年。”^[7]“全家人都出生在他(柏格理祖父)居住的那个小巷里。几个儿子中有一位是以制造绳索为生,他造的绳子供织鱼网、采矿、耕作及港湾的驳船之用。柏格理年轻时就曾经回来再访这条小巷,还有‘爸爸工作过的纺绳狭长走道’。”^{[2]1605}

据柏格理儿子沃尔特先生的追述可知,“那么,这位名叫塞缪尔·柏格理的传教士祖先的传说,就是有关康沃尔西部地区,罗马人入侵布利吞,岛上居民逃往西部山区,并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名叫柏格理的部落,以及世代居住在康沃尔直至今日这一部落后裔的传说。”^[8]

柏格理夫人埃玛·韩素音(Emma Hainge),原为内地会传教士人员。与柏格理结婚后,长期随柏格理在石门坎工作,极能吃苦耐劳。

张道惠(Hurry Parsons)出生于劳动者家庭,他的夫人安妮·布莱恩(Annie Bryant),出身于农民家庭。

王树德(William H. Hudspeth)即威廉·哈兹佩斯,据笔者向相关英国人士了解,他出身贫寒,但勤奋好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因为仰慕柏格理而来华,曾随柏格理等人在以石门坎为中心的苗族区域长期服务。1936年离开石门坎到上海就新任。抗日战争爆发时逗留在武汉,因救助中国难民,被日本侵略军关入上海浦东战俘营做苦工。抗战胜利后,得知石门坎办学的困难,毅然将个人的积蓄3万美元捐给滇黔川边教会学校。后返回英国,暮年生活穷困潦倒。

张道惠在中国出生的孪生子张绍乔、张继乔两位老传教士与艾莉森教授,称这些圣经基督教教会的传教士为康沃尔“少数民族”,说他们“在英国具有独特的传统”,“‘康沃尔人’不是在中国被人们所认定的那样一个少数民族,但是他们具有自己从古代传下来的语言和习俗,并且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

至于对康沃尔语的形成影响至深的盖尔特人,亦称“盖依德人”。是“英国少数民族之一,分布在苏格兰北部和西部山区和赫布里底群岛。约9万人(1978年),占全国人口0.2%。”^[9]

于是,这些圣经基督教教会传教士与滇黔川的各少数民族群众就有了一些巧合的共同点。如:

生活地域:都分别居住在本国不发达的西南山区。而我国西部苗族与这些康沃尔人一样,都有着一段被迫往各国西南山区迁徙的历史。

社会生活:各自在本国的生存条件艰苦,生活贫寒。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有着各自的民族、家支系统,而康沃尔人的传统社会组织则十分严密。

语言:英国康沃尔语的发音方式与某些词语具有独特的特征。巧合的是,康沃尔语与我国西部苗族的花苗支系的语言在一些发音上几乎完全相同。所以,柏格理、张道惠、安妮·布莱恩都能在短时间内熟练地掌握苗语,并成为石门坎学校使用汉语和苗语的双语教学老师。柏格理与苗族、

汉族布道员共同根据苗语川滇黔方言的滇东北次方言创造的老苗文,在西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心理因素:英国圣经基督教教会的传教士与中国的苗族、彝族等民族,都属于本国的少数民族族群。传教士对于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群众没有寺庙偶像崇拜、女孩缠足、溺婴等陋习,没有汉人社会中烦琐的礼数与典型的夫权,妇女地位较高等文化现象,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触。

由于这些巧合的因素,就使双方产生了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对于基督教的传播十分有利。如柏格理1903年11月深入凉山彝族即“诺苏”中访问。彝族群众仅凭柏格理有一位长着大脚并穿长裙的妻子,就认为他必定是个诺苏。

然而,除了本命题所探讨的内容,如果全面考虑圣经基督教教会迅速在滇黔川传播的原因,则应该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殖民侵略;我西南各族群众身受的残酷剥削和沉重压迫;柏格理等传教士出身于英国社会下层与少数民族族群。其中,发挥决定性主体作用的为中国西南各族群众。对这些因素的综合分析,方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前提。

参考文献:

[1]甘铎理、东人达译,在云的那一边——柏格理传记[M].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2]柏格理、甘铎理编辑,东人达译,柏格理日记[M].在未知的中国、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

[3]钱宁.基督教在云南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传播和影响[J].世界宗教研究,2000,(3):19.

[4]柏格理.东人达译,苗族纪实[J].贵州文史丛刊,1999,(1):91.

[5]杨明光.基督教循道公会传入威宁地区史略[Z].贵州宗教史料选辑第二期,贵州省宗教志编写办公室,1987.6.

[6]马可·史蒂文斯,乔治·威赫弗里茨.中国西南——不和拍的轨迹(K. Mark Stevens and George E. Wehrfritz, SOUTHWEST CHINA - Off The Beaten Track)[M].伦敦:COLLINS PRESS,1988.107.

[7]格里斯特.塞缪尔·柏格理(W. A. GRIST: SAMUEL POLLARD)[M]. London, New York, Toronto and Melbourne: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

[8]沃尔特·柏格理.苏大龙译,柏格理在中国[M].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二十八集,贵州省民族研究所,1989.1.

[9]陈永龄.民族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1013.

责任编辑 敖行维
 责校 张永光